



南国公共管理文库

陈 潭 / 主编

创新集群知识治理机制与政策研究

*A Study of Innovation Clusters Knowledge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Policy*

丁魁礼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南国公共管理文库

陈 潭 / 主编

创新集群知识治理机制与政策研究

丁魁礼 / 著

FL
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新集群知识治理机制与政策研究/丁魁礼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5

(南国公共管理文库)

ISBN 978 - 7 - 5161 - 5737 - 4

I. ①创… II. ①丁… III. ①知识经济—研究—中国 IV. ①F124.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305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田 文

特约编辑 陈 琳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25

插 页 2

字 数 217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国公共管理文库



组编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出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学术委员会

顾问：夏书章（中山大学）

主任：徐俊忠（广州大学）

委员：（按音序排列）

蔡立辉（暨南大学）

陈昌贵（中山大学）

陈振明（厦门大学）

陈 潭（广州大学）

董江爱（山西大学）

郭小聪（中山大学）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

林尚立（复旦大学）

倪世雄（复旦大学）

吴逢时（香港中文大学）

吴先明（武汉大学）

沈丁立（复旦大学）

童 星（南京大学）

徐湘林（北京大学）

薛 澜（清华大学）

姚先国（浙江大学）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

岳经纶（中山大学）

张其学（广州大学）

张 鸣（中国人民大学）

周敏凯（同济大学）

朱光磊（南开大学）

曹 蓉（西北大学）

陈社英（佩斯大学）

陈 光（西南交通大学）

丁 煌（武汉大学）

高小平（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何高潮（中山大学）

李 强（清华大学）

马 骏（中山大学）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

吴克昌（华南理工大学）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

唐任伍（北京师范大学）

肖 滨（中山大学）

徐晓林（华中科技大学）

严 强（南京大学）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

郁建兴（浙江大学）

张凤阳（南京大学）

张应强（华中科技大学）

钟书华（华中科技大学）

周志忍（北京大学）

朱仁显（厦门大学）

编辑委员会

主任：陈 潭

委员：（按音序排列）

丁魁礼	韩和元	蒋红军	李小军	李 智	刘建义
刘晓洋	刘雪明	刘 波	彭铭刚	沈本秋	汤秀娟
王枫云	王 琳	王 霞	肖生福	谢建社	谢俊贵
谢志岩	熊美娟	徐 凌	杨 芳	曾小军	钟育三
周利敏	周凌霄				

总 序

这是一个转型的时代，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随着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的创造和运用，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已经势不可当！

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里，人类社会对于知识、技术、制度、文化的要求将会越来越高，而知识的积累、传播、生产、更新和创造也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这个流动性的时代里，时代赋予了每一个人以同等的使命、机遇和挑战，而每一个人又是这个时代忠实的纪察者、参与者和记录者。站在这个时代的横断面上，作为时代最好的记录者之一，当下学术人必须捍卫真理、秉持操守，必须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必须淡泊名利、勇于担当，必须以科学的精神和专业的视角全部或部分地反映变革时代所涌现的人和事，总结已经变化了的社会实践活动经验，跟进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时代变革行为。

1917年，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于《心之力》的作文中写道：“故当世青年之责任，在承前启后继古圣百家之所长，开放胸怀融东西文明之精粹，精研奇巧技器胜列强之产业，与时俱进应当世时局之变幻，解放思想创一代精神之文明。破教派之桎梏，汇科学之精华，树强国之楷模。正本清源，布真理于天下！”1919年，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可见，学术人的学术研究只有“承前启后”、“与时俱进”、“解放思想”、“正本清源”和“彻底研究”，才能“布真理于天下”。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问题意识、分析技能、批判精神是学术人从事学术活动和走上职业化道路必备的三个要素。倘若缺乏了分析技能，自然也就缺乏对这个时代良好的判断能力、辨析能力和推理能力；倘若没有了批判

精神，也就无从谈起否定、反思和修正，就更无从说起创新和创造了。但是，如果没有了问题意识，那一切都将无从谈起。问题意识是时代的主题，是从事学术活动最起码的思维和思考方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是思维的起点，没有问题的思维显然是肤浅的、被动的。实际上，在既有的研究、思考和行文中，我们通常会不自觉地落入社会科学研究的“三段论”范式之中：到哪儿去发现问题和寻找问题？怎样诊断问题和分析问题？如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

我们知道，学术人从事的学术研究永远都脱离不了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永远都无法摆脱时代和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至于如何去“发现问题”和“回答问题”，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无论是不同学科，还是不同学派；无论是自然科学工作者，还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也许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发现解释，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和解决方案。但几乎同一的问题意识始终是学术人无法绕过的学术“自留地”，而围绕问题所达成的目标始终又几乎都是统一的。不管是晚睡还是早起，学术人始终都是全天候地思考并想象着的“孤独的探索者”。

作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从业者，必须具备宽广的知识基础和丰富的经验基础。公共管理研究离不开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的知识支撑，也离不开数学、哲学、法学、史学的思维支持。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类实践活动，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公共问题，单一的学科知识已经无法圆满回答涉及面广、跨越度大、复杂性高、系统性强的公共政策、公共事务、公共治理问题。因此，学科边界和知识壁垒不得不被打破，科际整合成为现实，社会科学的知识统一无法避免。如今，各行各业、各式各样的跨界行动，让我们目不暇接，单一的、传统的思维、专业和学科迟早会被颠覆。如果没有广博知识的涉猎和多学科方法的介入，公共问题的研究毫无疑问将会变得没有宽度、深度和新度。

同时，作为社会科学事业的公共管理研究，如果没有生动的实践和丰富的经验作为基础，任何研究都将走向空泛和无力。实践既是客观世界的直接活动，也是主观世界的能动反映，可谓“实践出真知”。明代理学名宦林希元有云：“自古圣贤之言学也，咸以躬行实践为先，识见言论次之。”作为直面实践的学问，公共管理研究既不能“坐井观天”，又不能“闭门造

车”，它必须以实践阅历与经验累积作为起码的思维铺垫和行动指南。它既需要“眼观六路”，又需要“耳听八方”，它既需要深入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又需要深入政府、学校、医院、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当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经过细致入微的观察、访谈和体验，开展案例、数据和其他有用信息的收集、鉴别与整理，才能采用“真方法”找到“真问题”。无法“顶天”，就得“立地”，唯有建立理论与经验的现实链接，学术研究才有洞察力、说服力和生命力！

众所周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了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毫无疑问，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建立和完善现代国家制度的必然产物，是实现国强民富、国泰民安、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不二选择。作为制度系统的组成部分，国家治理涵盖了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政党治理等多个领域以及基层、地方、全国乃至区域与全球治理中的国家参与等多个层次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凸显了政权管理者向政权所有者负责并被问责的重要性，强调了政权所有者、政权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多种力量协同共治的必要性，指向了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普遍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和建立和谐稳定社会秩序的可能性。

世界银行在《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善治”或“有效治理”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的关键。诚然，中国已经进入了从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向后期阶段迈进的新的历史时期，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浪潮有力地冲击着既有的国家治理体系并挑战着当下的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的转型和现代化建设将会促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制度建设更加科学、更加合理、更加完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公共事务管理不断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因此，深入开展公共治理研究无疑将有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第一，科学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表现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因此，实现良好的政府治理需要改革政府治理结构、完善现代政

府制度,需要明晰科学合理的政府边界,适当调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政府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监管不到位等“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问题。同时,实现良好的政府治理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第二,创新有序的地方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从纵向治理结构来看,作为一个巨型的治理共同体,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复杂性,国家治理需要地方性知识的累积,国家治理的创新需要地方治理的制度试验和“先行先试”。从横向治理结构来看,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分治”的现实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无法回避的制度瓶颈,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不均等、不便利仍然是割裂乡村治理和城市治理的主要因素。因此,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目标。

第三,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面对社会结构变化、社会矛盾凸显和利益格局调整,政府依靠自己的力量且沿用传统的社会管制方式已经过时,提高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水平势所必然。因此,政府必须立足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建立顺畅的民意诉求通道,协同各级各类社会组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坚持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同时,加快社会事业改革,完善政府服务购买方式,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解决好公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更好地满足公众需求。

第四,开放包容的文化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条件。基于宗教、信仰、风俗、道德、思想、文学、艺术、教育、科学、技术等范畴的意识形态和精神财富的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上层建筑和“软实力”。通过进行公共文化决策、公共文化事务处理、公共文化资源配置、公共文化产品提供等形式和方式,文化治理可以平衡不同人群之间的社会需求,可以有效

地建构公共符号、凝聚公众情感、陶冶公众情操、消解心理压力、疏导社会情绪。国家文化治理可以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途径开展,也可以以文化产业、文化产品的方式实现政治、经济、社会 and 文化的价值性转换,进而创新和重塑国家治理模式。

第五,和谐共生的生态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保障。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生态治理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开展生态治理,建设美丽中国,关系公众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毫无疑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智慧而有策略的顶层设计。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社会公正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普惠的原则,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权利、义务和福利;二是差异的原则,每一个社会成员具有先天禀赋和后天能力的差异,社会应该为弱势者提供一定程度的照顾和补偿。通俗地说来,“满足多数,保护少数”的国家治理能够达成社会最基本的“权”、“利”和“善”,能让公众幸福而有尊严地生活、让社会公正而又和谐地运转。为此,新时期的国家治理改革必须从原先的“从下至上、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单项突破”转变为“从上到下、以难带易、平行推进、重点突破”,选准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刮骨疗毒”和“壮士断腕”的勇气冲破障碍和阻力,从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

与此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学术人的公共责任和学术作为。当下的社会是一个需要表达的社会,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寻求逻辑建构的时代。社会需要知识,时代借力学术,具备学院水准、时代责任和人文关怀的学术人的学术修为、知识供给和理论贡献在今天变得尤为重要。为此,当下学术人必须提升学术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必须拓展学术开放度和学术自主性,必须具备国际化视野、专业化精神和本土化路线,从科学理论中寻找本土的现实注脚,从本土素材中提炼理论的科学养分,

回归常识，累积个案，追寻真实，积极推动原创研究、微观研究、深度研究的开展。

书山有路，学海无涯！站在南海边上的中国，我们尽情地展示我们的热情、我们的呼吸、我们的稚嫩。我们深知，在学术的门缝里，我们仅仅是蹒跚学步的孩子，只有站在前人和他人的肩膀上，才会看得更清、更高、更远！真心期待《南国公共管理文库》的编辑和出版能够为推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繁荣和发展尽点绵薄之力！

是为序！

陈潭

2014年2月24日

于广州大学城

内容摘要

知识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战略资产，学习是最重要的战略行为。创新集群的培育和发展影响区域竞争力乃至国家竞争力。培育创新集群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进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理念已经在决策层和学术界形成了高度共识。培育创新集群就必须实施高强度的知识和技术学习、构建契合的创新集群知识系统以及知识治理机制。

创新集群是以新知识生产、新产品大量出现为本质特征的创新型组织（创新型企业、各种知识中心和相关机构）在地理空间上集中或者在技术经济空间中集聚，并且与外界形成有效互动结构的产业组织形态。不论术语如何变换，诸如知识集群（knowledge clusters），技术集群（technology clusters），智力集群（intellectual clusters），以知识为基础的集群（knowledge-based clusters）；满足以上界定，均可以视为属于创新集群范畴。创新集群吸收了创新理论的重要成果；尤其创新系统研究是创新集群最主要的理论来源；创新集群也融合了区域理论、产业区、产业集群和创新地理学的理论成果。创新集群存在两个分析维度：地理空间维度和技术经济空间维度。“创新”是“集群”的定语，还是“集群”是“创新”的状语？这个争执实质是两个研究维度的争执，如果只是选取其中一个维度将误导以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

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的争论本质上涉及后发国家和地区是否具有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能力、吸收能力、学习强度以及制度学习能力。而这些问题在创新集群发展过程中就体现为：知识是如何有效生产、共享、协调、整合的，也即创新集群的知识治理机制问题。基于创新集群知识属性（知识库）和组织属性（联盟库）视角，根据知识库和联盟库的高低水平差异可以得出创新集群的不同阶段形态模型，然后根据这些阶段形态选择相契合的知识治理机制，是增进知识总量的供给，还是增进知识供应者与

知识使用者之间的连接，还是选择塑造共同文化、共同语言的知识平台项目。

知识平台的构建过程反映出创新集群的不同秩序和制度环境。在中关村创新集群信用知识平台构建过程中，主要反映出公共秩序的主导力量，中关村管委会作为主要发起人和组织实施主体。在杭州电子商务集群信用知识平台的构建过程中，主要反映出私人秩序的主导作用，领军企业作为主要发起人和组织实施主体。在公私秩序作用下借助于组织主体实现知识的螺旋运动，即知识共享化、内在化、形式化和联结化。

知识治理活动中存在一些典型组织，除了通常的领军企业之外，还有地区研究中心、合作研究中心等。创新集群的培育有赖于创新要素的连接和耦合，这些要素的连接和耦合必须由创新集群中的组织主体加以协调和整合。基于此研究了创新集群中组织的构成、组织间的竞争和合作以及组织发育的路径。

知识、组织和制度三者之间也存在共生演化关系。创新集群的知识、组织和制度的共生演化关系可以描述为：以现有知识存量、文化遗产为先导，经由组织认同，国家权威发起制度变革，直接或间接促进了知识生产机构的增加和质量的改善，在企业能力的整合下引发了微观组织的创新，这些创新又反哺知识生产机构，竞争和多样性的激荡作用又引致社会知识和社会理念的渐次改变。

Abstract

Knowledge is the most important strategic asset, and learning is the utmost strategic action. The fostering and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clusters can influence regional and even national competence. To cultivate innovation clusters has gained wide recognition among the decision – makers and academic world a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helps build an innovative nation and boost national competence. Intensive learning of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f suitable innovation cluster knowledge system, and knowledge governance mechanism are the three crucial criteria in the formation innovation clusters.

Innovation cluster is defined as the geographical or technological –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innovative organizations (enterprises, knowledge centers and related entities) that feature mass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nd effective interaction with outside world. No matter how the technical terms change, such as knowledge clusters, technology clusters, intellectual clusters, or knowledge – based clusters, any organization concentration that meet the above criteria can be seen as an innovation cluster. Innovation cluster studies absorbed the core findings of innovation theories, especially of the innovation systems studies; it also integrated in theories from Regional Theory, Industrial district, Industry Cluster and Innovation Geography. Innovation cluster studies are carried out in two dimensions: geographical and technological – space. Is “innovation” modifying “cluster”, or the other way around? Such debate reflects the focusing of different research dimension. One – sided research will later compromise our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Are the following – up countries advantaged or disadvantaged? The debate is actually a question about whether the following – ups are equipped with the

learning abilities of knowledge,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 and how well they can do them. Considered from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clusters, such questions can be interpreted into: how is knowledge effectively produced, shared, coordinated, and integrated, or in other words, the knowledg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clusters. Based on the knowledge attribute (knowledge stock)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ttribute (alliance stock), we are able to find out models of innovation cluster in different phases, and duly select a suitable knowledge governance mechanism; should we increase supply of knowledge volume, o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knowledge suppliers and users, or build a knowledge sharing platform that enables common culture and languag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knowledge platform can reflect different order and system in innovation clusters. In building of innovation cluster credit platform in ZhongGuanCun, the Management Commission acted as the major initiator and implementer, which showed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public hierarchy.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building of credit platform in Hangzhou E-commerce innovation cluster, leading private companies took the controlling position, a clear demonstration of private syste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and private powers, the subjects made spiral developments of knowledge, namely socialisation, externalisation, internalisation, recombination.

Apart from usual leading companies, region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are also typical organizations active in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 fostering of innovation clusters requires the connection and coupling of innovation elements, which is achieved through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the subjects in the clusters. Bearing all these in mind, the study attempts to study the constitution of organizations in innovation clusters, competition between organiz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approaches of them.

Institution and knowledge, organization and knowledge are both interacting; to observe on a higher scale, knowledge, organization and system can even be seen as a co-evolution system. Their co-evolution existence can be described as: led by the existing knowledge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recognized by the organization, the nation authorities initiates institution reform tha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oosts the increasing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quality impro-

ving. Innovations in micro – organizations are enabled through integration of entrepreneurs, which in turn rewards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entity. On the other hand, challenge and variety triggered changes in social knowledge and ideas.